



越文化研究丛书

沈松平  
著



# 越地方志 发展史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PRESS



越文化研究丛书

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重点研究基地(越文化传承与创新研究中心)课题成果  
(编号:16JDGH113)

绍兴文理学院越文化传承与创新研究中心资助出版

# 越地方志发展史

沈松平 著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PRESS

## 内容提要

本书为“越文化研究丛书”之一。本书主要内容包括越地方志发展的历史。从时间上讲,限于越地古代、近现代方志史的研究;从地域上讲,本书设定的越地范围即我们常说的“大浙东”范围,包括浙江省钱塘江以东的上八府和古时隶属绍兴的萧山。着重从方志体例的变化,以及越地方志名家学术思想演进所带来的推动,来阐述越地方志的递进式发展。其中,从编纂学角度阐述各个阶段越地对中国方志发展作出的贡献,中国古代修志流派中的纂辑、撰著之分,章学诚方志思想中主观认识上的偏差及对同乡后辈学者的影响,以及对近代越地学者寿鹏飞、陈训正、张其昀修志理论的研究等,均属本书的创新之处。本书适合各地修志人员、文史爱好者使用,也可作为大学、研究生教学参考用书。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越地方志发展史 / 沈松平著. —上海: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2020

ISBN 978-7-313-23708-8

I. ①越… II. ①沈… III. ①地方志-编辑工作-浙江 IV. ①K29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20)第 163974 号

## 越地方志发展史

YUE DIFANGZHI FAZHANSHI

著 者: 沈松平

出版发行: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邮政编码: 200030

印 刷: 当纳利(上海)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字 数: 246 千字

版 次: 2020 年 10 月第 1 版

书 号: ISBN 978-7-313-23708-8

定 价: 88.00 元

地 址: 上海市番禺路 951 号

电 话: 021-64071208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张: 15.25

印 次: 2020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告 读 者: 如发现本书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联系电话: 021-31011198

绍兴文理学院越文化研究院  
(浙江省重点研究基地越文化传承与创新研究中心)  
越文化研究丛书编委会  
(以姓氏笔画为序)

顾 问 安平秋 黄霖

委 员 干春松 王志民 刘毅青 朱万曙 汪俊昌 寿永明 李圣华  
张太原 陈书录 赵敏俐 胡晓明 柳巨波 俞志慧 郭英德  
诸凤娟 徐吉军 钱 明 黄仕忠 黄胜平 廖可斌 潘承玉

主 编 寿永明

执行主编 诸凤娟

# 目 录

Contents

导言 .....	1
一、文化学上的“越地”范围	1
二、中国旧方志发展概述	7
三、中国方志发展中的越地贡献	14
四、越地方志的著录和整理出版	18
第一章 雏形时期的越地方志 .....	28
第一节 越地方志的起源——《越绝书》《吴越春秋》	28
第二节 六朝隋唐时期的越地方志	41
第二章 方志定型以后的宋元明清时期越地方志 .....	50
第一节 古代方志定型中的越地贡献	50
第二节 会稽二志及《剡录》	53
第三节 宋元四明六志	65
第四节 《嘉定赤城志》	74

第五节 明清绍兴三志 80

第六节 乾隆、咸丰、同治鄞县三志 92

### 第三章 章学诚方志思想和乾嘉中期以后修志历史、

地理流派的形成 ..... 102

第一节 章学诚生平 102

第二节 章学诚方志思想的精华 106

第三节 章学诚方志思想批评 114

第四节 中国古代修志流派的新、旧之分 121

第五节 章学诚方志思想对同乡后辈学者的影响——以绍兴为例 129

### 第四章 方志历史、地理流派融合的前驱——清末王棻、

孙诒让的修志实践 ..... 145

第一节 王棻的修志实践及其自创一派的修志风格 145

第二节 孙诒让的修志实践及其方志学理论 159

第三节 王棻、孙诒让修志实践的影响 171

### 第五章 民国方志转型期越地方志名家学术思想的演进及

对近代方志转型的推动 ..... 178

第一节 寿鹏飞的志义说及其修志实践 182

第二节 余绍宋和《民国龙游县志》《民国重修浙江通志稿》 192

第三节 陈训正和《民国鄞县通志》 201

第四节 以现代地理学改造传统方志：张其昀的“新方志”实践 211

第五节 中国方志近代转型中的越地贡献 220

参考文献 226

索引 233

后记 235

---

# 导 言

---

## 一、文化学上的“越地”范围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根,是一个民族的魂,深深熔铸在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之中,是一个国家、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基础。中国是一个有着五千多年文明传统、历史悠久的国度,又是一个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的国度,其文化的时代性演进和地域性展开均呈现出婀娜多姿的状貌,因而切忌作简单化的描述与概括。著名历史学家谭其骧指出:“把中国文化看成是一种亘古不变且广被于全国的以儒学为核心的文化,而忽视了中国文化既有时代差异,又有其地区差异,这对于深刻理解中国文化当然极为不利。”<sup>①</sup>而要想获得对中国文化的深刻理解,对中国文化进行分区研究是必不可少的。地域文化的研究藉此而生。地域文化又称“区域文化”,学术界大多数人认为,它是一门研究人类文化空间组合的地理人文学科,与文化地理学大同小异。<sup>②</sup>也有人提出,地域文化仍属于文化学研究范畴,它是以文化为中心的考察文化的地域属性和特征的研究,而非以地理为中心的探讨地理环境如何影响和作用于文化的文化地理学研究。<sup>③</sup>或

---

① 谭其骧:《中国文化的时代差异和地区差异》,复旦大学历史系编:《中国传统文化的再估计——首届国际中国文化学术讨论会(1986)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1页。

② 路柳:《关于地域文化研究的几个问题——第一次十四省市地域文化与经济社会发展研讨会综述》,《山东社会科学》2004年第12期,第89页。

③ 白欲晓:《“地域文化”内涵及划分标准探析》,《江苏社会科学》2011年第1期,第78页。

称,地域文化是介于历史文化地理学与文化学、文化史之间的交叉边缘学科。<sup>①</sup>通俗地讲,地域文化是指一定空间范围内特定人群的行为模式和思维模式,它有一个前提即必须和其他周围区域有较为明显的差异,否则就没有什么意义,而不同地域内人们的行为模式和思维模式的不同,便导致了地域文化的差异性。地域文化的研究在我国始于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以后,当时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和历史评价,成为学术界、理论界的热门话题,而与“文化热”相伴随的是我国区域经济的复苏和发展,中华大地上各具特色的地域文化不仅能为地域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精神动力、智力支持和文化氛围,而且通过与地域经济的相互融合,形成文化经济,产生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直接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成为地方经济社会全面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推动力量和增强地域经济竞争能力的基础因素,这极大地催生了各地区对本区域历史文化的关注与开发,于是,以“文化热”为基础,以区域经济社会及文化发展为主导的地域文化研究开始在中国大地上勃然兴起,发展至今,仍方兴未艾,成为近三十年国内学术界新的学术生长点和热点之一,显示出旺盛的生命力和广阔的发展前景。地域文化的划分,一是以地理相对方位为标准划分,如江南文化、岭南文化、西域文化、关东文化等;二是以地理环境特点为标准划分,如长江三角洲文化、黄河文化、运河文化、海岛文化、大陆文化、高原文化、草原文化、绿洲文化等;三是以行政区划或古国疆域为标准划分,如云贵文化、巴蜀文化、齐文化、鲁文化、秦文化、晋文化、楚文化、吴文化、越文化等。冯天瑜在《中华地域文化大系丛书》中把中国文化分为东部农业文化区和西部游牧文化区,其中东部农业文化区可分为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原农业文化亚区和少数民族为主体的西南农业文化亚区。中原农业文化亚区自北而南又可分为燕赵文化副区、三晋文化副区、齐鲁文化副区、中州文化副区、荆楚文化副区、吴越文化副区、巴蜀文化副区、安徽文化副区和江西文化副区,中原文化亚区向北延展为松辽文化副区,向南延展为闽台文化副区和岭南文化副区;西南农业文化亚区又可分为滇云文化副区和贵州文化副区。西部游牧文化区则分为蒙新草原——沙漠游牧文化亚区和青藏高原游牧文化亚区,其中蒙新草原——沙漠游牧文化亚区又可分为塞北文化副区、甘宁文化副区、西域文化

<sup>①</sup> 参见张风琦:《“地域文化”概念及其研究路径探析》(《浙江社会科学》2008年第4期,第66页)、雍际春:《地域文化研究及其时代价值》(《宁夏大学学报》2008年第3期,第54页)。

副区。<sup>①</sup>

《越地方志发展史》为“越文化研究丛书”之一种。研究地域文化,首先要确定地域范围。越文化(越文化又往往与吴文化并称吴越文化,均为越族先民创造的文化)是我国上古时代南方蛮族中的一支——越族文化发展而形成的一种文化形态,从河姆渡文化时代到秦汉统一近五千年的漫长岁月中,古代越族在相对独立地发展过程中,形成了本民族独特的文化特征,古越文化与长江中游的荆楚文化、黄河流域的华夏文化交相辉映,共同形成了灿烂伟大的中国上古文明。关于越文化的定义,目前学术界有不同的看法,尚未形成一致的定见,有的认为是于越民族文化,有的认为是越国文化,有的等同于浙江文化,有的认为是浙东文化,有的认为仅仅是越文化中心地绍兴的文化,当然还有的取广义的百越文化,包括句吴、于越、东瓯、闽越、扬越、夷越、山越等民族的文化,其范围波及今天的江苏、上海、浙江、福建、台湾、广东、广西、贵州、云南。此外,还有学者提出对越文化可以分层次来把握,把越文化同时看作“于越民族文化”“越国文化”“浙江文化”“浙东文化”与“绍兴文化”,认为越文化是这五种文化的有机统一,其中居于主体地位的是浙江文化,于越民族文化是其发生学来源,是其萌芽阶段,越国文化是其方国阶段,浙东文化是其重心所在,而绍兴文化则是其关键内核。<sup>②</sup> 笔者认为,越文化的兴起与先秦于越民族和越国有着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于越文化是早期越文化的主体,但从长时段历史的角度看,越文化并不是单一的民族文化,而是一种开放的地域文明形态,越国灭亡后,越文化仍然在衍生发展,而其区域则应以原越国疆域为限。因为我们现在说的地域文化,其名多取自周代的诸侯国,这些诸侯国虽然早在秦统一中国时就陆续消亡了,但以周代诸侯国取名的地域文化与原诸侯国有一种内在的联系,从某种意义上说,原诸侯国所创造的文化是该地域文化之源,因此一般应以古诸侯国的疆域划定为该地域文化的范围。当然,这些古诸侯国的疆域是变化的,如越国在灭吴称霸后,国力达到鼎盛,不仅据有现在的浙江全境,还拥有江苏、江西、安徽、山东之一部,其都城一度由会稽北迁至山东琅琊(今山东省诸城县境内),显然根据越国强盛时期的疆域来划定越文化的地域范围是不妥当的,而应以越国历史上相对较为稳定的疆域作为划定越地的界限。一般而言,吴越交战前的越国疆域相对较为稳定,《越绝书》记载

① 冯天瑜:《中国的“文化区”概念》,《中国越学》第二辑,中国文联出版社2010年版,第15-16页。

② 潘承玉:《中华文化格局中的越文化》,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300页。

“大越故界，浙江至就李，南姑末、写干”<sup>①</sup>。就李又称携李，在今浙江省嘉兴市境内；姑末，今衢州市龙游县；写干，汉时属豫章郡，今江西省余干县，此为越国西境，与楚分界。《国语·越语》也说：“勾践之地，南至于句无，北至于御儿，东至于鄞，西至于姑蔑，广运百里。”<sup>②</sup>句无在今绍兴诸暨市境内，御儿也在今嘉兴市境内，鄞即今宁波市，姑蔑即姑末，乃一地而异名。就其范围，差不多是今天浙江省的范围。但自公元前494年越王勾践败于吴王夫差，入臣于吴，一直到公元前473年越国灭吴前，吴、越的疆界是以钱塘江为界的。《吴越春秋》卷8记载：“吴封地百里于越，东至炭渚，西至周宗，南造于山，北薄于海”<sup>③</sup>，海即后海，实为钱塘江南岸。《史记·货殖列传》也说：“浙江南则越”<sup>④</sup>。而在公元前334年，越国为楚威王所败后，其势力也退居于钱塘江南岸，《史记·越王勾践世家》中记载：“楚威王兴兵而伐之，大败越，杀王无疆，尽取故吴地至浙江（即钱塘江——笔者注），北破齐于徐州，而越以此散，诸族子争立，或为王，或为君，滨于江南海上，服朝于楚”<sup>⑤</sup>。从这个角度讲，钱塘江以南的浙江地区应该是古越国领土中最为稳定的区域。

另一方面，文化中的区域概念与行政中的区域概念是不同的，前者是大致上的，其边界是交融的，模糊的，而后者是明确的，其边界是清楚的，两者虽大体上可能相似，但决不能将两者等同起来。在古越国的范围内，如果从地域文化的属性看，至少还可以分为句吴<sup>⑥</sup>、于越、东瓯这样三个越文化的子系统，属地文化有相对的独立性，钱塘江以北的浙江地区属句吴文化，故民间自古以来就有“到江吴地尽，隔岸越山多”之说，把浙江一分为二，钱塘江以南的浙地（俗称上八府）视为越地，钱塘江以北的浙地（俗称下三府）视为吴地。东汉时越人王充在《论衡·

① [东汉]袁康、吴平辑录，乐祖谋点校：《越绝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64页。

② [战国]左丘明著，[三国吴]韦昭注，胡文波校点：《国语》，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426-427页。

③ [汉]赵晔著，[元]徐天祐音注：《吴越春秋》，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106页。

④ [汉]司马迁：《史记》第10册，卷一百二十九，货殖列传第六十九，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3267页。

⑤ [汉]司马迁：《史记》第5册，卷四十一，越王勾践世家第十一，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751页。

⑥ 句吴即春秋时期的吴国，也是越族先民创造的文化，据专家考证和研究，距今1万年以后，越族先民在迁移的第二阶段，一部分越族先民越过钱塘江进入今浙西和苏南的丘陵区，他们是以后的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和良渚文化等的创造者，历史上被称为句吴；而留在宁绍平原以及因自然环境恶化逐渐进入会稽、四明山区的越族，历史上则被称为于越、内越、大越。句吴和于越实际上是一族两国，他们在历史渊源、地理分布、文化传统等方面有许多共同性，只是由于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条件上的某些不同，才在繁衍发展的过程中，出现若干并不悬殊的差异，最后形成春秋时代的句吴和于越。

书虚篇》中说：“余暨以南属越，钱唐以北属吴。钱唐之江，两国界也。”<sup>①</sup>余暨即今天的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钱唐之江即今天浙江省境内的钱塘江。南宋祝穆所著地理总志《方輿胜览》也说：“会稽为越之绝，而山川之秀甲于东南，自晋以来，高旷宏放之士多在于此。至唐，余杭始盛，而与越争胜。”<sup>②</sup>余杭在今天浙江省杭州市境内，钱塘江之北，以余杭与越地并列，显然是把越地局限在钱塘江以南。清代顾炎武的《日知录》也有“昔人以钱塘为吴、越之界。唐释处默诗有‘到江吴地尽，隔岸越多山’之句，宋陈诗道亦有句云‘吴越到江分’”<sup>③</sup>的记载，道出了在社会大众心目中，钱塘江以南以东的浙东地区曾长期被当作真正的越地的事实。清代乾嘉学派著名学者顾栋高在《春秋大事表》卷四《春秋列国疆域表·越》中又说“余尝历淮、扬至余杭，尽吴之境”，而越国其地“全有浙江之绍兴、宁波、金华、衢、温、台、处七府之地。其嘉、杭、湖三府则与吴分界。由衢历江西广信府至饶之余干县，与楚分界”。<sup>④</sup>而反观目前研究吴文化的学者则一般把钱塘江以北的杭州、嘉兴、湖州三地划为吴文化发生的地域空间，划定今天的南京、镇江、常州、无锡、苏州、上海、嘉兴、湖州、杭州，甚至南通、扬州地区为吴文化区域<sup>⑤</sup>。

因此本书设定的越地范围，以绍兴地区为中心，其外延延伸至今天浙江省钱塘江以东以南的绍兴、宁波、舟山、金华、台州、温州、衢州和丽水地区，以及古时候隶属绍兴、今属杭州地区的萧山，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大浙东”的范围。从时间上讲，限于越地古代、近现代方志史的研究，不包括新中国方志编修情况。所谓浙东，作为一个地理范围，据《雍正浙江通志》记载：“元至正二十六年，置浙江等处行中书省，而两浙始以省称，领府九。明洪武九年，改浙江承宣布政使司。十五年割嘉兴、湖州二府属焉，领府十一。国朝因之，省会曰杭州，次嘉兴，次湖州，凡三府，在大江之右，是为浙西。次宁波，次绍兴、台州、金华、衢州、严州、温州、

① [东汉]王充著，陈蒲清点校：《论衡》，卷四，书虚篇，岳麓书社1991年版，第61页。

② [宋]祝穆撰，[宋]祝洙增订，施和金点校：《方輿胜览》，卷之六，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111页。

③ [清]顾炎武著，黄汝成集释，栾保群、吕宗力点校：《日知录集释》下册，卷之三十一，吴会，下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683页。

④ [清]顾栋高辑，吴树平、李解民点校：《春秋大事表》第1册，卷四，春秋列国疆域表，越，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547页。

⑤ 钱智：《吴文化区域系统初步研究》，《地理学报》1998年第2期，第123页。

处州,凡八府,皆在大江之左,是为浙东。”<sup>①</sup>这里的“大江”指的是钱塘江。这一地理格局是由唐代设置浙江东道奠定的。根据《新唐书·方镇表》所载,唐肃宗乾元元年(758),置浙江东道节度使,领越州、睦州、衢州、婺州、台州、明州、处州、温州8州,治所设在越州<sup>②</sup>,唐以后所称“浙东八郡”即指此八地。但唐德宗贞元三年(787),睦州又改隶浙江西道<sup>③</sup>,故宋以来又时见“浙东七郡”之称,即不把横跨富春江(富春江为钱塘江的上游)上游的睦州(即后来的严州)纳入浙东范围。如南宋祝穆的《方輿胜览》记浙东路共七州,不包括睦州,又据书中各州府之“建置沿革”记载,此七州在春秋时皆属越地。<sup>④</sup>南宋著名诗人王之望《汉滨集》卷七《条奏温州水灾后措置事件奏议》中说:“然浙东七郡,其四濒海,被灾轻重,各有等差”<sup>⑤</sup>;元袁桷《清容居士集》卷十九《贺兰堂记》记载:“李公之仕于江南也,常兢兢然,惠绥不忍侮其鳏寡,而其于浙东也,事若有素,今所领七郡,四为其守矣”<sup>⑥</sup>;明方孝孺《逊志斋集》卷二十二《林君墓表》中也说:“浙东七郡无一人以旱请于朝,而令独有忧民心,可嘉也。”<sup>⑦</sup>考虑到严州境域大半在富春江上游之西,而浙东、浙西之分又以富春江—钱塘江为界,因此对浙东文化的考察,亦应以绍兴、宁波、金华、衢州、台州、温州、处州七地范围为当。又据《新唐书·地理志》记载,此七州所辖地分别为:越州会稽郡:会稽、山阴、诸暨、余姚、剡、萧山、上虞,共七县;明州余姚郡:鄞、奉化、慈溪、象山,共四县;衢州信安郡:西安、龙丘、须江、常山,共四县;处州缙云郡:丽水、松阳、缙云、青田、遂昌、龙泉,共六县;婺州东阳郡:金华、义乌、永康、东阳、兰溪、武成、浦阳,共七县;温州永嘉郡:永嘉、安固、横阳、乐成,共四县;台州临海郡:临海、唐兴、黄严、乐安、宁海,共五县。<sup>⑧</sup>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浙东地区的温州、台州、处州虽属东瓯文化,属于越文化中而与于越文

① [清]李卫、嵇曾筠等修,沈翼机、傅王露等纂:《雍正浙江通志》,卷一,图说,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519册,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88页。

② [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第6册,卷六十八,表第八,方镇五,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903页。

③ [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第6册,卷六十八,表第八,方镇五,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910页。

④ [宋]祝穆撰, [宋]祝洙增订,施和金点校:《方輿胜览》,卷之六一卷之九,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104-161页。

⑤ [宋]王之望:《汉滨集》,卷七,奏议,条奏温州水灾后措置事件奏议,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39册,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758页。

⑥ [元]袁桷:《清容居士集》,卷十九,记,贺兰堂记,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03册,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263页。

⑦ [明]方孝孺著,徐光大学校点:《逊志斋集》,卷之二十二,林君墓表,宁波出版社1996年版,第729页。

⑧ [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第4册,卷四十一,志第三十一,地理五,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060-1063页。

化相对独立的子系统,考古资料和历史资料表明,早期的东瓯与居于福建的闽越同其族系,文化一致,故司马迁在《史记·东越列传》中将它们合称为“东越”。但春秋战国以后,至秦汉时期,先是受越国的影响,后受到汉族文化的影响,浙南的文化面貌逐渐与太湖、钱塘江流域趋同,至六朝时期,浙南文化与福建文化已明显不同,而成为吴越文化的一部分,故本书设定的越地范围将原属东瓯文化的浙南温州、台州、处州三地囊括于内。

## 二、中国旧方志发展概述

地方志是指全面系统地记述某行政区域自然、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历史与现状的资料性文献<sup>①</sup>。如果用通俗的话说,它就是一种特殊的史书,是记录特定地域某一时期地情的资料性的官修史书。地方志是我国民族文化特有的瑰宝。编修地方志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自隋代官修以来,历代都有编纂。据《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统计,仅保存至今的旧方志<sup>②</sup>就有 8264 种,11 万余卷,约占我国现存古籍的 1/10 左右,而且这 8264 种旧志指的还是综合志(不包括总志),不包括 300 多种专志(山水、祠庙、名胜志)。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地方志这一古老而优秀的民族文化传统得以继承并发扬光大,进入了盛世修志的时代,其发展速度是以前任何一个朝代都望尘莫及的。如果说北宋神宗熙宁八年(1075)是我国有据可查的朝廷设局修志的开始,那么常设修志机构的建立则是在 20 世纪 80 年代改革开放以后。2006 年 5 月 18 日,《地方志工作条例》的颁布,标志着我国修志工作进入了法制化的轨道,各级地方志办公室大部分纳入了参照公务员管理系列,成为各级政府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其主要职务行为就是编修地方志和地方综合年鉴。2015 年 8 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了《全国地方志事业发展规划纲要(2015—2020 年)》,这是继《地方志工作条例》以后又一份对地方志事业发展具有指导意义的重要文献。它既是我国地方志事业发展的第一部规划性文件,也是指导“十三五”时期乃至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地方志工作的纲领性文件,标志着地方志工作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即依法治志阶段,由原来单

<sup>①</sup> 《地方志工作条例》,中国地方志领导小组办公室:《地方志工作文献选编》,方志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3 页。

<sup>②</sup> 习惯上,我们把 1949 年以前编修的志书称作“旧志”,而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编修的志书称作“新志”。

纯的修志编鉴工作发展为一项事业,从“一本书主义”向志、鉴、库、馆、网、用、会、刊、研、史“十业并举”转型升级,目标是形成地方志编修体系、理论研究和学科建设体系、质量保障体系、资源开发利用体系、工作保障体系“五位一体”的地方志事业发展综合体系,我国的地方志事业正处于有史以来一个前所未有的黄金发展时期。据中国地方志领导小组办公室统计,截至2014年5月,新中国第一轮修志工作基本完成,全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西藏<sup>①</sup>、香港、澳门、台湾未统计在内)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累计出版省、市、县三级志书8000多部。这还是指纳入国家规划的三级志书,其他如乡镇志、村志、街道志、专业志、部门志、专题志、山水志、祠庙志、名胜志等各式各样的“小志”,其数字更是惊人。仍以中国地方志领导小组办公室的统计,截至2014年12月,全国共编修出版部门志、行业志、专题志22802部,乡镇村志、街道社区志4308部,山水名胜古迹志496部,地情书9868部。而新中国第二轮省、市、县三级志书规划5916部,截至2014年12月,也已出版1972部,其中省级志书378部,市级志书150部,县级志书1444部。<sup>②</sup>上述新旧志书是我国历史文化遗产中弥足珍贵的部分,也是人类文明中独具特色的成果。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博士曾说过,古代希腊乃至近代英国,都没有留下与中国地方志相似的文献,要了解中国文化,必须了解中国的地方志,“在中国出现的一系列地方志,无论从它们的广度来看,还是从它们的有系统的全面性来看,都是任何国家的同类文献所不能比拟的。凡是熟悉中国文献的人都知道,在中国的文献中有卷帙浩瀚的‘地方志’,它们确实是当地的地理和历史著作(总称方志,涉及一个省的称通志,下面几级则称府志、州志或县志),其他各类文献在卷帙浩瀚的程度上很少能够和这类文献相比”<sup>③</sup>，“在西方,有没有可以和这些卷帙浩瀚的文献相对比的文献呢?希腊和希腊化的古代文化并没有留下与此相似的文献,而且从中世纪初期以来,这类著作似乎也不多……”<sup>④</sup>

地方志的种类按所载内容的广狭程度划分,可分为通志(综合志)和专志两种。通志(综合志)所载内容广泛,基本总括了一地的自然、社会、人文诸方面的历史与现状,其主要种类有总志(全国性志书)、省志、府志(市志)、州志、厅志、县

① 西藏自治区首轮修志工作的启动晚于其他各省,1996年6月,西藏自治区才成立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着手西藏地区方志的编修工作,所以第一、二轮修志合并进行。

② 冀祥德、于伟平:《中国方志发展报告(2015)》,方志出版社2015年版,第3-4页。

③ [英]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五卷,地学,第一分册,科学出版社1976年版,第44-45页。

④ [英]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五卷,地学,第一分册,科学出版社1976年版,第50-51页。

志、区志、都邑志、乡镇志、村志、坊巷志(街道社区志)、边关志、卫所志、土司志、盐井志等。专志则包括专业志(行业志、非行业的事业志)、部门志、专物志(即记述某一专门事物古今全面情况的志书,如宫殿、园亭、寺庙、道观、祠墓、书院、山水、名胜等志)、专题志(如风俗志、艺文志、物产志、北京奥运会志等)、人物志。我们都知道,志书修出来,是为了用的。方志的功能,从宋代开始,就有“存史、资治、教化”之说,但社会在进步,原有的方志功能也在延伸,地方志在今天已具备了存史、资治、教化、兴利、科研的五大功能,其中,存史是原生性的结构功能,在此基础上,通过在社会中的利用与开发,产生出了资治、教化、兴利、科研等派生性功能。所谓派生性功能,即是指方志经使用而表现出来的社会功能。

关于地方志的起源,各种说法长期并存,迄今未有一致的结论。但“方志”的名称最早见于《周官》确是确定的事实,从那时算起,迄今已有 2500 多年的历史。但在宋代方志定型前,地方志尚处于雏形阶段,或偏重于地理,或偏重于风土,或偏重于人物,仅备后世定型方志之一体,还没有出现后世那样的综合性志书。秦汉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时期,雏形方志有图经、图志、郡书、地理书、都邑簿、风俗传、耆旧传、地记、地志等各种名称,根据其内容与形式,大致可归纳为郡书、地记、都邑簿、图经 4 类。唐代刘知几在《史通》中将正史与古史两类以外的史学著作,归于“杂述”之中,列作十种,“一曰偏纪,二曰小录,三曰逸事,四曰琐言,五曰郡书,六曰家史,七曰别传,八曰杂记,九曰地理书,十曰都邑簿”<sup>①</sup>。其中,郡书、地理书、都邑簿多记郡国及畿辅诸事,记载虽不齐全,叙述亦颇简单,但于一方山川、都邑、道里、物产、户口、人物、民情、风俗,每有所录,体例亦初备,可以看作是方志发端。地理书即地记、地志之书(地记、地志实属一类,只是名称略异而已),与郡书同为杂述,但性质却相异,郡书主人物,而地理书主风土,秦汉以后的地理书往往兼及人物传记的内容,正如余嘉锡所说“郡国书可不记地理,而地理书则往往兼及人物”<sup>②</sup>,但即使这样,与定型方志相比相去甚远,未涉及政治、军事、经济、艺文,内容也较为简单。都邑簿记载都城城池、郭邑、宫阙、苑囿、观阁、仓廩、陵庙、街廛等,辨其规模,明其制度,属于都城史志一类。此外,图经<sup>③</sup>也是雏形方志的一种,由“图”和“经”两部分组成。图,即地图;经,即文字说明。金毓绂在

① [唐]刘知几:《史通》,卷十,杂述三十四,《四部丛刊初编》第 70 册,上海商务印书馆 1926 年版,第 70 页。

② 余嘉锡:《四库提要辨正》,卷七,史部五,中华书局香港分局 1974 年版,第 393 页。

③ 图志与图经实属一类,只是名称略异而已。

《中国史学史》中说：“图经亦辟建置沿革，人物古迹，以备史之一体，且为宋以后郡县志所本。故述方志，不能置图经而不数。”<sup>①</sup>图经的内容较地记广博，但是没有人物传，与宋代以后的定型方志相比，仍有不小距离，只能算是雏形方志。

地方志的官修始于隋大业年间，隋炀帝“普诏天下诸郡，条记风俗物产地图，上于尚书。故隋代有《诸郡物产土俗记》一百五十一卷，《区宇图志》一百二十九卷，《诸州图经集》一百卷。其余记注甚众”<sup>②</sup>。唐、两宋继承了隋代官修志书的制度。唐代，朝廷设有专门官吏管理图经编修工作，尚书省兵部设职方郎中、员外郎各一人，“掌天下之地图，及城隍、镇戍、烽候之数，辨其邦国都鄙之远迩，及四夷之归化者”<sup>③</sup>，还明确规定了州县定期造送制度。宋代则建立了临时的修志机构修志。北宋神宗熙宁八年（1075），朝廷设九域图志局，编修《元丰九域志》，这是我国有据可查的朝廷设局修志的开始。到了南宋，官修制度进一步完善，地方当局也开始设局修志。《景定建康志》的编纂者周应合在该志《修志本末》中叙述了他受南京留守、建康知府马光祖的聘请，“开书局于钟山之下”，“入局修纂”《建康志》的经过。在这篇文章中，周应合一列出了书局人员的编制、分工：有主纂者的助手，有事务管理人员，有抄写人员，也有专管收发传递的人。至此，我国初步确立了由官方设立修志机构，提供编纂经费，并指派官员组织或聘用有学识的人员负责编纂，代官府立言，为官府服务的官方修志传统和修志制度。官修志书制度的确立，是我国方志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它使过去的私修及“半官修”地记、郡书逐渐为官修志书所代替，开创了志为官重、为官修志的新时代，间接地也促进了方志的繁荣，并走向定型。清代学者郭嵩焘说：“地志体例，经始于北宋，至南宋而始备。”<sup>④</sup>方志学前辈专家朱士嘉也说：“宋志上承《史》、《汉》余绪，下为后来方志编纂学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如果说，汉以来修史者无不奉《史》、《汉》为圭臬，那末，宋以来修志者几乎莫不以宋志为楷式了。”<sup>⑤</sup>古代方志在宋代开始定型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志书的名称开始称“志”，名实开始相符，尤其是进入南宋以后，称图经或其他称呼的志书大幅度减少，乃至接近消亡；二是就体例上而言，我国旧志体例有纲目体、平列体、纪传体、三宝体、三书体、纪事本末

① 金毓黻：《中国史学史》，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139 页。

② [唐]魏征、令狐德棻：《隋书》第 4 册，卷三十三，志第二十八，经籍二，中华书局 1973 年版，第 988 页。

③ 《唐六典》，卷五，尚书兵部，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595 册，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 年版，第 61 页。

④ [清]郭嵩焘等：《光绪湘阴县图志》，卷首，郭嵩焘序，清光绪六年县志局刻本。

⑤ 朱士嘉：《宋元方志传记索引》，序，中华书局 1967 年版。

体、编年体、章节体(清末出现),但后5种志书出现的不多,旧志的主要体例是纲目体、平列体、纪传体,这3种体例在宋代都已出现并广泛运用。至于志书的体裁方面,包括凡例、无题小序、大事记、专业分志、人物传、图、表、附录,在宋代也都出现了;三是在内容上,宋代的志书包括图、大事记、沿革、山川、物产、城郭、关隘、津梁、学校、风俗、户口、古迹、寺院、艺文、人物、姓氏、职官、选举、诗文、杂事等门类,凡后来古代方志所有的内容,除方言等个别内容外,基本上都已具备了。

元明清的方志编修与宋代相比,总体上是沿袭,没有改变大体格局,但在某些方面有所发展:第一,在志书的类型上,宋代已经出现了总志、府志、州志、县志、乡镇志、专志,元代则新增了通志(省志)、一统志,至明代又出现了卫所志、边关志、土司志,清末光绪年间出现了乡土志<sup>①</sup>;第二,在志书的体例上,至明代出现了三宝体、纪事本末体、编年体,清代乾嘉时期出现了三书体,清末光绪年间又出现了章节体志书;第三,在修志范围上,元代以后随着疆域的扩大,几乎遍布全国各地,边缘省份也开始修志,从而改变了南宋时代集中于江苏、浙江、湖北、湖南、四川、江西、福建等地的局面,当然,其时南方各省所修志书的数量仍明显多于北方,尤其是江南一带,尽管南人在元朝最受歧视,而文化之盛,不减前代。而到了清代,一些原来修志比较落后的北方省份,如河北、山东、山西、河南等省,其修志的数量甚至超过了以往修志比较发达的江浙等省,而且由于清代时异地编纂志书已成为常态,北方各省志书的质量也未必逊色于南方。

方志学学科形成于清乾嘉时期,其奠基人是浙江绍兴上虞的章学诚<sup>②</sup>,其所著史学理论专著《文史通义》与唐代刘知几的《史通》被视为我国封建时代史学理论的“双璧”,也是第一部方志学的著作。至清代,方志形成了两个比较清晰的流派<sup>③</sup>,以章学诚、鲁一同等为代表的方志新派(或称撰著派、文献派、历史派)和以戴震、孙星衍、洪亮吉为代表的方志旧派(或称纂辑派、考据派、地理派)。方志新

① 对乡土志的性质,目前有两种看法,一种认为乡土志即乡镇志,但大多数人则认为乡土志不等于乡镇志,它专指伴随着清末废科举、兴学堂的展开,肇自于清光绪末期,延及宣统,并贯穿于民国时期的乡土志、乡土教科书、乡土调查录一类的书,是方志的又一类型。

② 章学诚是我国方志学学科奠基人这个说法,也有少数人提出不同看法,如傅振伦认为中国方志学的创立者应是民国时期的李泰棻,其标志是1935年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了《方志学》一书,见傅振伦:《方志学的创始人究竟是谁》(《方志研究》1993年第6期,第60页);王广荣则认为直至民国,方志学学科也没有诞生,见王广荣:《章学诚有没有创立“方志学”》(《河北地方志》1997年第3期,第7页)。

③ 巴兆祥认为,至明代,方志已形成了历史、地理、实用三个流派,只是不如清代成熟和清晰,见巴兆祥:《明代方志类型、流派述略》,《江苏地方志》1992年第3期,第38-41页。